

# 1960-70 年代美國史學家對「區域主義」、「奴隸制度」與美國內戰相關性的主要解釋

盧令北\*

## 摘要

美國內戰始終是美國史研究的一個焦點。在十九世紀「業餘史學」時期，多數與內戰相關的論述，仍延續戰前南、北區域相互對立的態勢，互指對方為陰謀的策劃者與動亂的根源，並應擔負戰爭的責任。然自二十世紀以降，隨著「專業史學」的興起，昔日流於情緒化的歷史解釋方式逐漸為史學家所揚棄，代之而起的是以史料為基礎所進行的研究，因而對內戰解釋也逐漸回歸客觀與理性。本文擬就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美國史學家對內戰前美國歷史發展的兩大特色——「區域主義」以及「奴隸制度」，與內戰起源的關聯性所做的解釋做一探討。此時期史學家討論內戰的最大特色是擺脫道德層面的思考模式，不再將「區域主義」、「奴隸制度」與內戰的起源做直接的連結。相反地，史學家轉而探究南、北兩區域以往均能和平共處，為何至 1850 年代起衝突對立卻急遽升高，導致區域和平無以為繼。此外，史學家也跳脫

\* 東吳大學歷史系專任助理教授。本文係由 2007 年 5 月 19 日於東吳大學歷史學系主辦「第六屆史學與文獻學研討會」所宣讀之論文“American Civil War Historiography: From Sectionalism, Slavery, to Secession”改寫而成。承蒙當時論文評論人孫同勳教授及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許多寶貴修改意見，於此一併至上謝意。



以往單純將奴隸制度視為戰爭主要導火線的窠臼，開始分析奴隸制度與南方社會有何緊密的關連，南方人何以堅持奴隸制度並不惜自聯邦分離。

**關鍵詞：**區域主義、奴隸制度、分離運動、廢奴主義、美國內戰、南方社會、美國史學、美利堅邦聯。



## 一、前言

1861 年所爆發的「美國內戰」(American Civil War)，或俗稱的「南北戰爭」，是西方世界自 1815 年至 1914 年間所經歷規模最大，且傷亡人數最多的一場軍事衝突。這場戰爭不僅結束長期以來的南、北區域對峙局面，迫使脫離聯邦另組「美利堅邦聯」(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的南方各州無條件投降，更直接摧毀南方長久以來的社會與經濟基礎及制度。1869 年，內戰甫結束，時為哈佛大學教授的喬治·蒂克納(George Ticknor, 1791-1871)即言，這場近 62 萬人犧牲的戰爭，必然成為劃分美國傳統與未來的一道分水嶺；此戰爭不但影響美國未來的發展，而美國也勢將成為國際矚目的焦點。<sup>1</sup> 蒂克納所言非假，美國歷史的發展因為內戰的發生而有全然不同的風貌；內戰的結束，象徵美國邁向現代化的一個起點，成為日後美國晉身世界強國之林的重要過程。

然而內戰何以發生？林肯總統(Abraham Lincoln, 1809-1865)認為引發內戰的責任並不在他或是北方，南方各州所組成的「美利堅邦聯」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1865 年 3 月 4 日，林肯在其第二任總統就職演說中明確指出：

四年前的此時，全國上下都為即將爆發的內戰而焦慮不安。大家都怕戰爭，也都想逃避戰爭。當時我在此發表就職演說，極

---

<sup>1</sup> James M. Mc Pherson, *Ordeal by Fire: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2), p. x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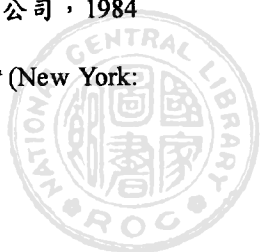
力呼籲大家要避免戰爭以解救聯邦。然而在同時，叛亂份子卻圖謀毀滅聯邦，分裂聯邦。南、北雙方雖同聲反對戰爭，可是有一方卻不惜犧牲國家而寧願一戰；另一方則寧可一戰也不願國家滅亡，戰爭於是爆發。<sup>2</sup>

另一方面，對曾任「美利堅邦聯」總統的傑佛遜·戴維斯(Jefferson Davis, 1808-1889)而言，南、北軍事衝突則完全肇因於北方。戴維斯抨擊北方的激進團體，結合「自由土地黨」(Free Soil Party)與「共和黨」等政治權謀人士，假借人道主義之名，行對南方政治與經濟侵略之實。戴維斯在其1881年出版的《美利堅邦聯政府的興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nfederate Government)一書中表示，自聯邦分離是南方長期以來處於不公平與不公義制度下的唯一選擇；南方人所爭的是原則，而非僅是維護奴隸制度而已。戴維斯強調：

做為一個自主的政治實體，南方各州有其正當權利自聯邦分離，任何否定此原則的舉措，都是違背聯邦政府是基於各州間的契約關係而建立的基本精神。因此，聯邦政府對分離的南方動武，不但是藐視憲法，更是破壞獨立宣言所揭櫫的原則。<sup>3</sup>

<sup>2</sup> 林肯就職演說原文參見：The Avalon Project at Yale Law School, Inaugural Addresses of the Presidents,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of Abraham Lincoln: <http://www.yale.edu/lawweb/avalon/president/inaug/lincoln2.htm>. 引文修改自李本京編，《美國歷任總統就職演說集》(台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4年)，頁193-94。

<sup>3</sup> Jefferson Davi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nfederate Government* (New York: D. Appleton, 1881), Vol. I, p.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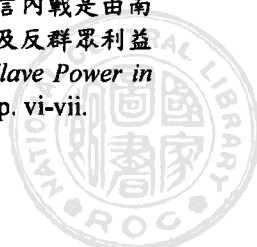


林肯與戴維斯互相指責對方區域須為內戰負起責任的論調，也就是十九世紀結束前，許多與內戰相關論述的基本模式。<sup>4</sup> 在此「業餘史學」時期，論述者基本上還是囿於論其個人在地褊狹的觀點，對內戰的起源各執一辭，立場迥異。在敘述時，時而情緒，時而主觀，不但互指對方為陰謀的策劃者與動亂的根源，更應擔負戰爭的責任。如北方作家芬頓(A. W. Fenton)在其著作中就直指內戰實際上是一場「叛亂戰爭」(War of the Great Rebellion)，南方各州以林肯當選總統為由脫離聯邦而獨立，實際上是一項長期策劃的陰謀。北方為了維護憲法的尊嚴、人民的利益與國家的存亡絕續，被迫與南方對抗。芬頓強調北方參與內戰的正當性與正面性，直稱內戰的結果讓南方得以邁向繁榮之路，並促進雙方人民的交流與互信。<sup>5</sup> 不過對南方人而言，內戰則是場「南方獨立之戰」(War for Southern Independence)，是由北方人所引發的違憲且不具任何正當性的一場侵略戰爭。前阿肯色州的州眾

---

<sup>4</sup> 湯瑪士·普里斯里(Thomas J. Pressly)將 19 世紀末美國有關內戰的觀點大致歸類為三派，一派為北方觀點，認為南方是戰爭的罪人。其次是南方觀點，視北方為侵略者。最後一派則保持中立，認為內戰是原先是可避免的，但經由南、北雙方的極端份子煽動所引發。關於 1875 年以前有關內戰的看法，可參見：Thomas J. Pressly, *Americans Interpret Their Civil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sup>5</sup> A. W. Fenton, *A Prospect: How the States of the Federal Union. North and South, Met the Crisis of 1861*, pp. 1, 77-79, A. W. Fenton Papers, the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the William P. Perkins Library, Duke University. 此外，麻州出身的前美國副總統亨利·威爾森(Henry Wilson, 1812-1875)也直言內戰是由南方龐大的奴隸主勢力所引發的一場反共和政體、反基督徒、以及反群眾利益的一場革命。Henry Wilson,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lave Power in America* (Boston: J. R. Osgood and Company, 1875-1877), Vol. 1, pp. vi-vii.



議員約翰·羅傑斯(John Henry Rogers, 1845-1911)直言，內戰的責任不在南方，南方各州自聯邦體系脫離並不代表聯邦政府與憲法的解體。戰爭之所以發生，肇因於由北方人主導的聯邦政府長期漠視南方主權，並欲以威脅恫嚇的方式強逼南方各州留在聯邦，接受北方制度與領導而導致的集體反彈。<sup>6</sup>

自二十世紀以降，隨著「專業史學」漸成氣候，昔日流於情緒化且類似史事評析的內戰論述方式也逐漸淡出，代之而起的是以史料為主要基礎所進行的學術研究，而其解釋也逐漸回歸理性。<sup>7</sup> 一般而言，傳統史學家在討論內戰時，習於在諸多可能的歷史因素中歸納一個主因來做為戰爭的起源，而「區域主義」(sectionalism)與「奴隸制度」(institution of slavery)則是其中最常見的原因之一。然自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起，隨著美國介入越南問題日深，民權與其他社會抗議運動在全國各地風起雲湧展開，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平靜穩定社會與保守主義風潮隨之瓦解。面對社會環境的丕變，史學界

---

<sup>6</sup> John Henry Rogers Papers, Southern Historical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sup>7</sup> 依據約翰·漢姆(John Higham, 1920-2003)教授的劃分，美國史學發展經歷三階段，第一階段在 17 世紀，為「清教徒史學家時期」(Puritan Historians)；第二階段在 18 世紀初期至 19 世紀末葉，為「貴族史學家時期」(Patrician Historians)；第三階段則自 1870 年以後，為「專業史學家時期」(Professional Historians)，詳見 John Higham,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5), pp. 3-5. 目前國內對於美國內戰史學的所進行的研究甚少，迄今仍以孫同勳教授的論述最為詳盡與深入，惟孫教授之研究時期主要集中於 1960 年代以前美國史學家的解釋，詳見孫同勳，〈美國史學家對南北戰爭的解釋之演變〉，《美國研究》11：2(台北：1981.9)，頁 1-37。



開始從新的視野與更多元的角度來檢視內戰，而以往學界慣於由歸納單一戰爭原因做為研究內戰主要切入點的研究方式也逐漸淡出。史學家開始思考「區域主義」與「奴隸制度」在美國社會存在已久，為何會在 1850 年代無以為繼，並引發全面的南、北軍事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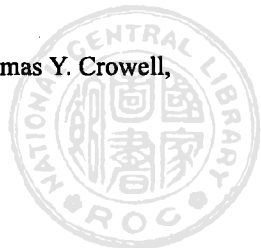
本論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美國歷史學家研究內戰的方向有何具體的轉變？本文首先將「區域主義」與「奴隸制度」在美國歷史的發展過程做一說明，其次將分析 1960 至 1970 年代，最具影響性與代表性的 6 位美國史學家的主要論述，了解他們如何從新的觀點與角度來詮釋「區域主義」、「奴隸制度」與內戰之間的關連性，藉以說明內戰研究方向的轉變，並期能對十九世紀美國由「合」至「分」的過程有更深入的了解。

## 二、「區域主義」與「奴隸制度」的發展

已故美國著名政治學者佛帝摩爾·凱伊(Valdimer Orlando Key, 1908-1963)曾強調區域主義的高漲對國家團結與安定有絕對的威脅。凱伊指出，區域主義的發展，導致區域間的鴻溝加深，不僅將國家割裂成數個政治集團，不同區域間更時而將對方視為外來者、異類甚或是寇讎而相互攻訐。<sup>8</sup>

---

<sup>8</sup> V. O. Key,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64), p. 233.



內戰前美國歷史的發展適足以說明因區域主義過度膨脹，進而導致國家分裂的情形。區域主義一向是美國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特色，而討論區域主義的發生，基本上可上溯至殖民時期。南、北區域發展型態互異與先天的地理環境有直接關係。南部殖民地由於地形遼闊，加上氣候溫和與土壤肥沃，因此以大規模墾殖的農業經營方式遂應運而生。相較於南部，北部殖民地因地形狹小，氣候濕冷，作物生長不易，農業發展的基礎自然不若南部深厚。然而北方先天優良的港灣地形，則直接促成北部居民在從事漁業之時，進一步發展海外貿易。雖然史學家對於十三個殖民地在美國獨立前是否已形成一致性的「美國文化」尙未形成一致共識，但史學家基本上並不否認在殖民時期，十三個殖民地已逐漸融合、形成四大區域，並發展出具有地方特色和自我屬性的區域文化。此四大文化區域由北至南分別為「新英格蘭地區」(New England)、「中部地區」(Middle Colonies)、「奇薩彼克地區」(Chesapeake)以及「南部地區」(Lower South)等區域。在獨立戰爭發生之前，殖民地人民已習慣將「新英格蘭地區」與「中部地區」視為所謂「北方」，而將「奇薩彼克地區」與「南部地區」合稱之為「南方」。<sup>9</sup>

<sup>9</sup> 詳見Jack P.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Colon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David Hackett Fischer, *Albion's Seed: 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一般咸認為「新英格蘭地區」是形成日後美國文化的主要核心。不過根據前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傑克·葛林(Jack P. Greene)的研究，相較於「新英格蘭地區」，「奇薩彼克地區」所發展出的社會結構與文化才是建構美國文化的主要基石。葛林認為「新英格蘭地區」保守的宗教意識形態造成該地區較



在殖民時期四大文化區域形成的過程中，區域主義也隨之而生。隨著南、北兩大區域的逐漸形成，兩區域間因文化差異與自身利益所產生的相互角力，在美國早期歷史發展過程中也屢見不鮮。在獨立戰爭期間，南、北雙方爲了是否繼續對英國貿易與徵召黑人入伍等事產生歧見；及至獨立建國，進入「邦聯時期」(Confederation)，南、北雙方仍舊爲了關稅與自身的利益爭鬧不休。<sup>10</sup> 南、北區域間的衝突在 1787 年於費城召開的「制憲會議」(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中更趨激烈。有「美國憲法之父」美稱的詹姆士·麥迪遜(James Madison, 1749-1812)在會後直言制憲會議所出現的諸多爭議與歧見，主要就是來自於南、北兩區域的對立。<sup>11</sup> 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在其卸職演說中也明確表達他對日益昇高的區域對立與黨派之爭相互結合的憂心。<sup>1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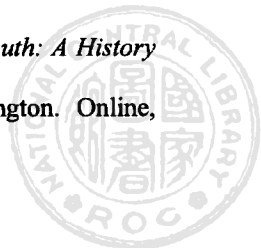
---

封閉的社會型態，人口的結構也缺乏多樣性，與現今所認知的美國文化特色有相當的差距，詳見 Jack P.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pp. 55-80。所謂「中部殖民地」是因為該區域內的四個殖民地(紐澤西、賓西法尼亞、紐約以及德拉瓦)均位於大西洋沿岸的中部，故稱之。而「奇薩彼克地區」殖民地主要指「維吉尼亞」與「馬里蘭」兩殖民地。

<sup>10</sup> 如新英格蘭地區極力堅持有權在紐芬蘭島(Newfoundland)海域捕魚，而南部地區則極力爭取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 river)流域的航行權。理查·艾爾登(Richard Alden)強調南、北區域間的衝突自 1775 年至 1789 年間已至為明顯，詳見 Richard Alden, *The First South*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1)。

<sup>11</sup> William J. Cooper and Thomas E. Terrill, eds., *The American South: A History*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6), p. 102.

<sup>12</sup> "The Farewell Address," in the Papers of George Washington. Onlin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Available: <http://gwpapers.virginia.ed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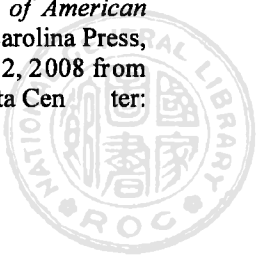
自十九世紀開始，區域主義的發展更形具體。美國經濟在 1840 年代至 1850 年代進入大幅擴張時期後，隨著南、北差異的拉大，南方早期因為較早開發所占有的經濟及其他優勢也逐漸為北方所超越，南、北雙方對一些重要的經濟議題也產生許多歧見。諸如北方人主張提高工業產品進口關稅、建立貿易壁壘，而南方人則堅持低關稅，以降低農業生產成本。此外，為因應經濟快速擴張，北方人支持國家(中央)銀行的設立，而南方人自獨立建國開始，就反對類似的金融機構，認為這是行政權的過度擴張，有違憲與侵犯州權之嫌。<sup>13</sup> 此時期北方由於鐵路與工廠的廣為興建，與仍維持農業型態的南方形成明顯的對比。以 1840 年為例，北方人比南方人擁有更高的人口比例從事於商業、貿易與製造業，而北方投資於製造業與工業相關部門的資金也遠超過南方。這種差距到了 1860 年更形擴大，以工廠的設置而言，全美國有 78% 的工廠集中在北方，而南方僅佔了 22%。<sup>14</sup>

南方除在工商業的投資與產值上落後北方之外，在人口數量上也落居下風。自 1840 年至 1860 年的二十年間，南方人佔全國人口的比例由原先的 43% 降至 39%。南方在人口數量的劣勢直接反映於南方人在聯邦國會所佔的席次，自 1820 年至 1860 年內戰爆發前間，南方

---

<sup>13</sup> David M. Pott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completed and edited by Don E. Fehrenbacher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76), pp. 32-33.

<sup>14</sup> Douglas C. 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 eds., *The Growth of American Economy to 1860* (Columbia,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68), pp. 238-39; *Historical Census Browser*, Retrieved on July 12, 2008 from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Geospatial and Statistical Data Center: <http://fisher.lib.virginia.edu/collections/stats/histcensus/index.html>.



在聯邦眾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的席次逐年遞減，比例由 42% 降至 35%，而北方的席次比例則由 58% 增加至 63%，佔有絕對的優勢。(見表 1) 另在聯邦參議院席次方面，南、北區域席次均衡的局面也因為 1850 年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的加入聯邦而打破。至 1861 年，參議院全部 68 個席次中，南方佔 30 席，北方則佔 38 席。<sup>15</sup>

南、北雙方在聯邦參、眾議院席次的消長，也正意味著北方的政治勢力逐漸超越南方。對南方人而言，在南、北政治勢力失衡的情況下，北方可恣意運用其政治實力的優勢，遂行其目的，而南方在聯邦中的傳統地位則有隨時被北方吞噬之虞。如當時美國重量級的商業評論雜誌《帝波評論》(DeBow's Review)所言，南方在人口數量上落後北方，造成南方在國會席次與「總統選舉人團」(Electoral College)趨於劣勢，直接導致南方政治勢力的沒落。《帝波評論》強調，在如此明顯不利的情況下，南方人對現行聯邦制度是否真能保障南方的安全與利益抱持高度的懷疑。<sup>16</sup>

---

<sup>15</sup> 依據美國憲法第一條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聯邦參議院是由每州選出兩名參議員所組成。從十九世紀開始，若有自由州(亦即該州憲法禁止蓄奴之州)申請加入聯邦，國會往往搭配另一蓄奴州(該州允許奴隸制度存在)加入，以維持南、北雙方在參議院席次的均衡。至 1848 年為止，南、北雙方(蓄奴州與自由州)在聯邦內各有 15 州，在參議院各佔 30 席。然自 1850 年迄 1861 年內戰爆發，南方的總州數即未曾增加，而北方的州則陸續加入加利福尼亞(1850)、明尼蘇達(Minnesota, 1858)、奧瑞岡(Oregon, 1859)以及堪薩斯(Kansas, 1861)等四州，因此在參議院的席次一舉超越南方而成為多數。

<sup>16</sup> *DeBow's Review*, 29 (October 1860), pp. 448-465. 《帝波評論》由南卡羅萊納出生的統計學家詹姆斯·帝波(James Du nwoody Br ownson DeBow, 1820-1867)於 1846 年在路易斯安納州的紐奧爾良市(New Orleans)所創辦。《帝波評論》的主要內容除刊載全國及海外重要的商業訊息之外，該雜誌發行的主

表 1：美國眾議院席次分佈，1820 年至 1860 年

	1820		1830		1840		1850		1860	
	席次	比例	席次	比例	席次	比例	席次	比例	席次	比例
北部	123	58	141	59	135	61	142	61	152	63
南部	90	42	99	41	88	39	90	38	85	35
西部	0	0	0	0	0	0	2	1	4	2
總席次	213		240		223		234		241	

資料來源：Kenneth C. Martis and Gregory A. Elmes, eds., *The Historical Atlas of States Power in Congress, 1790-1990*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93), pp. 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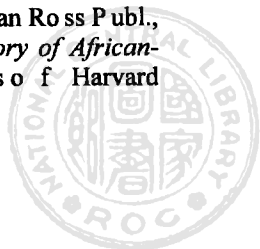
要目的在有系統的介紹南方的經濟環境，並匯集南方各州的商業與天然資源訊息，提供全國各地的投資人參考，藉以吸引投資並加速南方經濟的開發與繁榮。《帝波評論》所提供的商情資訊種類繁多，舉凡內河航運狀況、農工業發展、自然資源的分布與開採、進出口貨物的統計、各州的經濟發展與商業活動、國際貿易、以及對社會與政治現況(含國外)的報導與評論等均涵蓋在內。帝波本人及《帝波評論》捍衛奴隸制度並支持南方各州的分離運動(secession movement)，認為南方唯有自聯邦分離，奴隸制度方能獲得保障及發展，而南方也得以求得安身立命並獲得真正的長治久安。

南、北區域的差異因奴隸制度的存在而更形強烈。奴隸制度雖非美國人所首創，但美國卻是第一個，極可能也是世界近代史上惟一一個透過內戰方式來終結奴隸制度的國家。目前所知，北美洲第一批約二十人的非洲黑奴，於 1619 年正式引進維吉尼亞(Virginia)殖民地，在殖民時期，北起紐澤西(New Jersey)，南至喬治亞(Georgia)，均看得到奴隸的蹤跡。北方各州自 1777 年起陸續廢除奴隸制度，而隨著南方棉花種植區域的急速擴展，勞動人力需求孔急，奴隸人口的分布也逐漸南移，至 1818 年，奴隸主要分布於賓夕法尼亞州與俄亥俄河以南的地區，成為南方社會主要的特色與制度。根據 1790 年美國第一次人口普查統計資料顯示，全國奴隸人數已超過七十萬人，絕大多數集中於南方，而北方的奴隸人口總計四萬餘人，僅佔全國奴隸總數的 6%。至 1860 年，根據第八次人口普查資料統計，南方的奴隸人口已高達三百九十五萬餘人，而北方僅有 64 人。維吉尼亞州的奴隸總數高居全國第一，而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的奴隸佔全州人口總數的比例則高達 57%，居全國第一。<sup>17</sup>

隨著美國領土自十九世紀起持續向西擴展，奴隸制度是否也能隨之延伸至新取得的疆域，遂不斷引發南、北區域的尖銳對立，甚至爆發

---

<sup>17</sup> 上述百分比數據係根據以下資料來源綜合計算得來：*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p. 1168; Joseph C. G. Kennedy,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1860: Compiled from the Original Returns of the Eighth Censu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Interior* (New York: Norman Ross Publ., 1990), pp. 598-604; Ira Berlin, *Generations of Captivity: a History of African-American Slave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abl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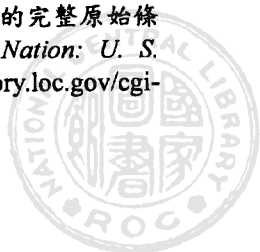


實際衝突。1817年，密蘇里(Missouri)地區申請加入聯邦，而奴隸制度是否能存在於該地區則迅速引發爭議，因為當時美國共有22個州，蓄奴州與自由州各半，所以密蘇里以何種身分加入聯邦，均會對南、北區域在全國政治版圖的消長有決定性的影響。面對南、北緊張對立的情勢升高，1820年，在眾議院議長亨利·克雷(Henry Clay, 1777-1852)的折衝協調下，南、北雙方取得妥協，史稱「密蘇里妥協案」(Missouri Compromise)。此案一方面同意密蘇里以蓄奴州的身分加入聯邦，另一方面也允許北方的緬因(Maine)以自由州的身分一同加入。此外，國會也規定未來密蘇里州以北，亦即北緯36度30分以北的地區一律禁止蓄奴。<sup>18</sup>

「密蘇里妥協案」並未解決任何有關奴隸制度或南、北對立的問題。1846年，美國與墨西哥爆發戰爭，1848年戰爭結束，美國自墨西哥取得現今新墨西哥、猶他、內華達、亞利桑那、加利福尼亞、德克薩斯等州及科羅拉多州西部等總計將近一百三十餘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而美國的領土一舉擴張至太平洋岸。1850年，加利福尼亞申請加入聯邦，猶如1820年密蘇里爭議的翻版，奴隸制度是否能存在於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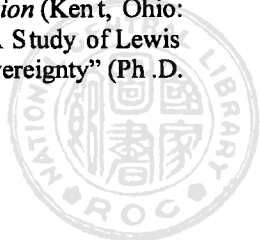
<sup>18</sup> Everett S. Merville Brown, ed., *The Missouri Compromises and Presidential Politics, 1820-1825, from the Letters of William Plumer, Junior* (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0); Robert Pierce Forbes, *The Missouri Compromise and Its Aftermath: Slavery & the Meaning of Americ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The 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 1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Washington, D.C., 1820), pp. 545-48. 「密蘇里妥協案」的完整原始條文與影像，可參見：*A Century of Lawmaking for a New Nation: U. S. Congressional Documents and Debates, 1774-1875*, <http://memory.loc.gov/cgi-bin/ampage?collId=llsl&fileName=003/llsl003.db&recNum=586>



加利福尼亞再次成爲南、北集團角力的重點。此爭議雖然於「1850年妥協案」(Compromise of 1850)中允許加利福尼亞以自由州身份加入聯邦暫獲解決，但1854年國會所通過的「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對於新加入聯邦的各州是否採行奴隸制度卻改採開放態度，允許各新加入的州依據「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的原則，自行決定引進奴隸制度與否。<sup>19</sup>「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推翻了先前「密蘇里妥協案」有關北緯36度30分以北地區禁止蓄奴的規定。此法案一通過，南、北區域擁奴與反奴的勢力

---

<sup>19</sup> 「1850年妥協案」最終作成五點結論：一、同意加利福尼亞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聯邦。二、新墨西哥與猶他兩地區是否蓄奴，則由當地居民依據「人民主權」原則決定。三、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奴隸貿易禁止。四、通過更嚴苛的奴隸逃亡法案(Fugitive Slave Act)，對逃亡的奴隸與窩藏、收留逃亡奴隸的相關人士與團體給予更嚴厲的處罰。五、補償於1845年加入聯邦的德州一千一百萬美金，以彌補該州因疆界的重新劃分所造成的損失。關於「1850年妥協案」的討論，詳見：John C. Waugh, *On the Brink of Civil War: The Compromise of 1850 and How It Changed the Course of American History* (Wilmington, Del.: SR Books, 2003); Michael F. Hol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Whig Par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Mark J. Stegmaier, *Texas, New Mexico, and the Compromise of 1850*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K. Jack Bauer, *The Mexican War, 1846-1848*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4); Holman Hamilton, *Prologue to Conflict: The Crisis and Compromise of 1850*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4)。最早提出以「人民主權」方式處理自墨西哥取得的土地是密西根州的聯邦參議員路易·卡斯(Lewis Cass, 1782-1866)。卡斯認為國會無權干涉奴隸制度的存廢，各州蓄奴與否，應交由該州居民自行決定，詳見 Willard Carl Klunder, *Lewis Cass and the Politics of Moderation*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Walter William Stevens, "A Study of Lewis Cass and His United States Senate Speeches on Popular Sovereignty"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59)。



更如脫韁野馬般恣意於新領土上擴張勢力，相互傾軋，加速區域主義的膨脹與區域對立的白熱化。

### 三、「區域主義」與內戰的相關性：波特與霍特的解釋

區域主義向來是史學家討論內戰起源的重要議題之一，1920年代的「進步學派史學家」(Progressive historians) 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ustin Beard, 1874-1948)就曾以「經濟利益衝突論」解釋內戰起源，認為內戰前南、北區域因經濟發展的模式與步調互異，因此加深了彼此的對立。以工業為主的北方長期以來以其優越的經濟實力強壓以農業為主的南方，迫使南方在關稅、鐵路修建以及開發新領土等議題上退讓，內戰的爆發即為南方在北方長期的經濟壓迫下反彈所致，北方才是發動內戰的元兇。<sup>20</sup>「進步學派史學家」認為內戰的爆發是長期以來社會中不同集團、階級與區域間經濟利益衝突累積的結果，是無法避免的。

不過 1930 年代興起的「修正學派史學家」(Revisionist historians) 與「南方史學家」(Southern historians)則挑戰「進步派史學家」所言

<sup>20</sup> Charles A.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7), Vol. 2, Ch. 1 and 2. 「進步學派史學家」認為歷史研究中只有主觀，沒有客觀；只有相對，而無絕對。「進步學派史學家」認為美國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充滿階級衝突與對立，而此正是美國得以不斷進步的原因。關於美國「進步史學」的發展、演變與主要特色，詳見孫同勳，〈美國進步史學初探〉，《美國研究》12：1(台北：1982.3)，頁1-26。



經濟利益導致區域衝突，以及內戰是無法避免的理論，強調內戰是一場「沒有必要的戰爭」(needless war)。<sup>21</sup> 修正學派認為南、北區域的差異存在已久，但是此差異隨著時間的演進被非理性的過分誇大並無限上綱，終至衝突一發不可收拾。<sup>22</sup> 著名的「南方史學家」法蘭克·

<sup>21</sup> 「南方史學家」於 1930 年代隨著「南方民族主義」(southern nationalism)的高漲而興起。「南方民族主義」在內戰前即顯見於南方各州，是帶領南方分離運動的一股重要力量。內戰結束後，南方民族主義逐漸式微，至 1930 年代，民主黨因共和黨無法有效處理經濟大恐慌而全面執政，傳統的南方民主黨勢力遂趁勢而起，再次帶起南方民族主義風潮。當時多名南方人士為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所延攬，進入政府擔任要職，時為副總統約翰·嘉納(John Nance Garner, 1868-1967)即為最佳例證。嘉納出生於德州，曾連續擔任 30 年的聯邦眾議員，在與小羅斯福搭檔競選前，嘉納為聯邦眾議院議長，見 William J. Cooper, Jr., Thomas E. Terrill, eds., *The American South*, pp. 644-645; Bascom Nolly Timmons, *Garner of Texas, a Personal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1948)。藉由「南方史學家」們的努力，「南方史」(Southern History)成為美國史研究中一個重要的專業領域，自 1934 年成立的「南方歷史學會」(The Souther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SHA)即可視為此一專業化趨勢的代表。「南方歷史學會」的主要學術刊物為《南方史季刊》(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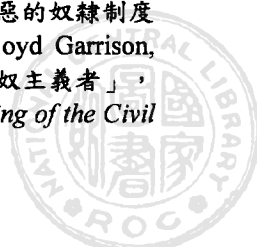
<sup>22</sup> 如艾佛瑞·克雷文(Avery O. Craven, 1885-1980)就認為南、北區域的差異在彼此雙方的投機政客與極端主義份子的挑釁下逐漸受到激化，進而產生對立，「人民的恐懼不斷升高，進而憎恨彼此，而對所有事物的立場都被迫簡化成兩種選擇，對與錯、好與壞。反對者被視為邪惡的化身，而好人也只能在殺人與被殺兩者間做選擇。」詳見：Avery Craven,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C. Scribner's Sons, 1942), p. 2,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Civil War: Ego centric Sectionalism,"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7 (February 1941), pp. 3-18; Gerald N. Grob and George Athan Billias, eds.,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History: 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Vol. 1, pp. 384-386。詹姆士·藍道爾(James G. Randall, 1881-1953)認為北方的「立即廢奴主義者」與南方的「食火者」(Fire-Eaters)等激進團體，甚至是當時屬於「愚蠢的一代」(blundering generation)的美國人都應該負起戰爭責任，見 James G. Randall, "The Blundering Generation," *Mississippi Valley*

奧斯理(Frank Lawrence Owsley, 1890-1955) 雖然同意比爾德所言北方長期以來對南方的壓迫導致戰爭的發生，但奧斯理認為南、北衝突的核心不在於經濟，而在於價值觀與意識形態的差異。他認為北方的「反奴運動」(anti-slavery movement)與激進的「廢奴主義者」(abolitionists)及其黨羽始終敵視及醜化南方及其生活方式，並意圖在政治、經濟、宗教等各方面全面打壓南方，在此嚴峻的情況下，南方堅持其立場與制度並無可議之處。奧斯理強調，戰爭的爆發，在於北方自恃其為國家的唯一正統代表，意圖於文化與經濟方面全面掌控南方所致。<sup>23</sup>

---

*Historical Review*, 27 (June 1940), p. 3-28. 所謂「食火者」意指 1850 年代南方各州激進的支持奴隸制度者，這群人包括政治人物與知識份子，力倡分離運動。知名的「食火者」有阿拉巴馬州的威廉·嚴西(William Lowndes Yancey, 1814-1863)以及維吉尼亞州的艾德蒙·洛芬(Edmund Ruffin, 1794-1865)。關於「食火者」，詳見：Eric H. Walter, *William Lowndes Yancey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6), *The Fire-Eaters*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Betty L. Mitchell, *Edmund Ruffin, A Biograph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 Avery Craven, *Edmund Ruffin, Southerner: A Study in Secess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sup>23</sup> Frank Owsley in George Brown Tindall, ed., *The Pursuit of Southern Histor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of the Souther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35-1963*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pp. 85-89; Owsley in Michael O'Brien, *The Idea of the American South, 1920-1941*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170, 173, 179. 「廢奴主義者」與「反奴主義者」在立場與手段上有所區別。兩者雖同樣反對奴隸制度，但「反奴主義者」的立場較為溫和，主張透過理性的方式解決。而「廢奴主義者」則較激進，除希望透過修憲方式徹底禁絕奴隸制度外，更將南方人視為助長邪惡的奴隸制度的幫兇。著名的「廢奴主義者」有威廉·蓋里遜(William Lloyd Garrison, 1805-1879)以及約翰·布朗(John Brown, 1800-1859)。關於「廢奴主義者」，可參見：James Brewer Stewart, *Abolitionist Politics and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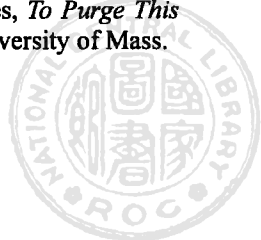
進入 1960 年代，以往認為內戰起源肇因於南、北區域差異過大，亦即認為區域主義直接引發戰爭的論點，開始被史學家們重新檢視。故史丹佛大學教授大衛·波特(David M. Potter, 1910-1971)就質疑區域主義與內戰的發生是否有絕對的必然性。波特強調，徵諸於世界歷史，各國或各區域間的發展差異所在多有，即使在一國之內，不同地區經濟發展的模式，也常因其所在地理位置的差異而有所不同，但未必一定導致戰爭的發生。因為即使區域間經濟發展的步調與方向不盡一致，但實際上卻往往能彼此互補，進而產生相互依存的關係，使得各區域間更形團結。<sup>24</sup>

此外，波特也不認為內戰前南、北兩區域存在著如比爾德等所形容的難以調和的巨大矛盾。波特並不否認南、北區域間的確存有差異，但他同時指出，美國自 1840 年代開始，南、北兩區域所呈現的共通性與一致性，實際上是遠超過傳統認知上的歧異性。因為美國人口中，超過百分之九十的國民為本地所出生，多數美國人，無論身處

---

*War*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8); Thomas G. Mitchell, *Anti-slavery Politics in Antebellum and Civil War America* (Westport, Conn.: Praeger Publishers, 2007); Lewis Perry, *Radical Abolitionism: Anarchy and the Government of God in Antislavery Though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 關於蓋里遜，可參見：Henry Mayer, *All on Fire: William Lloyd Garrison and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William E. Cain, ed., *William Lloyd Garrison and the Fight Against Slavery: Selections from The Liberator* (Boston: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1995). 關於布朗，可參見：Evan Carton, *Patriotic Treason: John Brown and the Soul of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Stephen B. Oates, *To Purge This Land with Blood: a Biography of John Brow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 Press, 1984).

<sup>24</sup> David M. Pott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pp. 8-17.



南方、北方或其他區域，對於基督教、國家主義、共和主義等價值觀與人身自由的概念都有相近的認知與體認，因此縱使南方與北方的地理與經濟環境有所差異，但在整體的文化上卻是一致而無衝突的。<sup>25</sup> 波特認為比爾德將內戰發生的原因歸咎為南、北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過於牽強，缺發立論根據。雖然波特強調南、北區域的共同性大於其差異性，惜未能進一步解釋南、北雙方為何仍舊走上衝突之路。

對維吉尼亞大學榮譽教授麥可·霍特(Michael F. Holt)而言，他雖同意南、北區域間存在著巨大差異，不過他並不認為其中任何一項差異，包含奴隸制度在內，就足以引發內戰。在其 1978 年出版的《1850 年代的政治危機》(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一書中，霍特以一個全新的視野與思考點來分析區域主義與內戰間的相互關係，為內戰的研究開啓一個新的方向。霍特跳脫以往史學家強調區域主義或何種區域差異才是導致內戰發生主因的傳統窠臼，轉而探討區域主義既然已存在於美國歷史許久，南、北區域在以往都能相安無事，但為何在 1861 年卻必須走上軍事衝突之路？霍特認為以往南、北區域間雖然時有衝突，但由於政治體系運作得宜，因此區域間的差異與差距並未產生任何副作用。然自 1850 年代起，由於舊有的政治結構瓦解，新的政治體系又無法調合區域間既有的差異與歧見，在缺乏相互協調

---

<sup>25</sup> David M. Pott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pp. 8-17, 33-34, 469. 另根據艾德華·裴森(Edward Pessen)的分析，南、北社會中勞動階層所獲得的經濟待遇所差無幾。上層社會同樣也由少數富有階級所把持，而律師、商人、富人在南、北社會中同樣佔有領導地位，Edward Pessen, "How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Were the Antebellum North and Sout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5 (December 1980), pp. 1119-49.



與制衡機制的情況下，南、北區域長期以來的對立遂引發全面的軍事衝突。

霍特指出，美國在 1850 年代所面臨的危機主要來自於政治方面：其一，由「惠格黨」(Whig Party)與「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所建立的「第二次政黨政治體系」(the Second Party System)於此時瓦解；其二，選民對現行政治制度缺乏信心，並存有高度的不信任感，因此給予政治野心家可乘之機。<sup>26</sup>

---

<sup>26</sup> 美國獨立建國之初政黨政治並未成形。1787 年，由於邦聯體制窒礙難行，因此召開制憲會議討論接替方案。會議中支持聯邦體制的「聯邦派」(the Federalist)與擔心州權遭受侵害的「反聯邦派」(the Anti-Federalist)開始成形。「聯邦派」於 1792 年正式轉型為「聯邦黨」(The Federalist Party)，大約於同時，「反聯邦派」人士也另組「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與之抗衡，美國歷史上的「第一次政黨政治」(The First Party System)於焉形成。第一次政黨政治於 1824 年因為聯邦黨的式微而結束。「第二次政黨政治」的興起則始於民主黨的安德魯·傑克森(Andrew Jackson, 1767-1845)擔任總統期間，由於傑克森總統個人行事風格較易引起爭議，且作風強悍，因此反對他之人另組「惠格黨」與之抗衡。「惠格黨」於 1852 年沒落，1854 年「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結合其他反奴勢力而崛起，美國進入「第三次政黨政治」時期。關於美國第一、二次政黨政治的發展與演變，詳見：Sean Wilentz, *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5); Michael F. Hol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Whig Party: Jacksonian Politics and the Onset of the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olitical Partie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Age of Jackson to the Age of Lincol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Stanley Elkins and Eric McKittrick, *The Age of Feder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William Nisbet Chambers, ed., *The First Party System: Federalists and Republicans* (New York: Wiley, 1972); Linda K. Kerber, *Federalists in Dissent: Imagery and Ideology in Jeffersonian Americ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 Lance Banning, *The Jeffersonian Persuasion: Evolution of a Party Ide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8); Richard Hofstadter, *The*

霍特對於「第二次政黨政治體系」的運作給予高度的評價。他指出，當時的兩大黨，「惠格黨」與「民主黨」，均屬於全國性的政治組織，黨員來自全國各地。由於黨員結構多元，因此兩黨在屬性上也均為溫和性政黨，為爭取不同區域民眾的支持，兩黨的政治立場不走偏鋒，政治訴求也多兼容並蓄，廣納南、北區域民眾的個別需求。而在兩黨理性的相互競爭、彼此監督的情況下，掌握政治實權的政黨也很難只為特定團體或區域的人民服務。所以在「第二次政黨政治」的運作期間，選民對政黨的忠誠度是遠高於對某單一地區的認同，即使南、北區域充滿了差異性且時有摩擦，但現行政黨政治制度適足以調和並稀釋彼此雙方的歧見。<sup>2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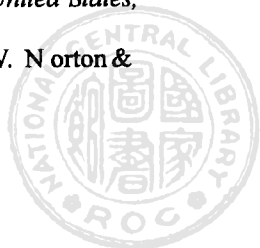
然而「第二次政黨政治」發展至晚期卻面臨政黨同質化的窘境，亦即「惠格黨」與「民主黨」運作的模式與型態、發展路線、政治立場以及各項訴求都過於類似，毫無新意，因而導致選民認為現行政黨政治已然失去以往相互競爭、相互監督的基本精神，兩黨既已同流合污，而選民的利益也就無法獲得保障。在此情況下，選民的政治熱情逐漸冷卻，對現行政治體制的不信任感急速增加，因而造成「惠格黨」與「民主黨」的選民支持度大幅下降，終至「第二次政黨政治體系」於 1852 年瓦解。<sup>28</sup>

---

*Idea of a Party System: The Rise of Legitimate Oppos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8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sup>27</sup> Michael F. Holt,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3), pp. 7-8, 17-38.

<sup>28</sup> Michael F. Holt,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pp. 101-38.



選民既已對「惠格黨」與「民主黨」兩個全國性政黨失去信心，不認為全國性的政黨可以保障地區的利益，因此轉而支持在地的政黨，如北方人為 1854 年始成立的「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所吸收，而南方人則多投效於「南方民主黨」(Southern Democratic)。當全國性政黨消失，南方人與北方人對各自區域的忠誠度超越國家認同時，政治的發展就日趨極端，而彼此的歧見就更難調和，因此也給政治野心家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表演舞台。為尋求選民支持，地區性政黨與政治人物不惜激化南、北區域的既有矛盾並無限上綱，為此加速區域主義的膨脹，進而導致南北區域兵戎相見。<sup>29</sup>

#### 四、「奴隸制度」與內戰的相關性：傑諾維西、錢寧、摩根與松頓的解釋

除區域主義外，1960 年代之前許多與內戰相關的論述，也多習於將戰爭的原因歸咎於奴隸制度，而堅持此一邪惡制度的南方則必須為戰爭負起全部的責任。<sup>30</sup> 然自 1960 年代開始，史學家在討論奴隸

<sup>29</sup> Michael F. Holt,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pp. 6-8, 219-59.

<sup>30</sup> 如十九世紀後期「業餘史學家」的代表人物，且於內戰期間擔任聯邦參議員(1855-1873)，以及其後擔任格蘭特總統(Ulysses S. Grant, 1822-1885)第二任期的副總統(1873-1875)一職的亨利·威爾森(Henry Wilson, 1812-1875)所言，邪惡的奴隸制度是造成內戰的主因，而捍衛該制度的南方要為戰爭負起責任，「奴隸制度將奴隸貶低為個人私產，奴隸並被視為從事耕種的動物。他們猶如被上帝所遺棄的賤民，不但被剝奪任何享有法律保障的權利，也為整個社會所摒棄。奴隸制度戕害了百萬人的天賦人權，此制度不但是非理性的，更是違反基督教戒諭。．．．．．南方以近似革命的方式起而叛亂，而

制度與內戰時，已逐步擺脫以往囿於道德層面來劃分戰爭責任的論述方式，轉而以個別的南方州為研究對象，具體而微地分析奴隸制度與南方社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藉以說明南方人何以如此堅持奴隸制度，甚至寧願為此自聯邦分離，並與北方兵戎相見。

---

北方則為了捍衛共和的精神與體制，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與存亡絕續，被迫投入這場流血衝突。」見Richard Leopold, *Problems in American History*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6), p. 329; Gerald Grob and George Billias,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History: 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Vol. 1, p. 243. 即使在二十世紀初，許多史學家也持類似論點。以麻塞諸塞州(Massachusetts)出生的詹姆斯·舒勒(James Schouler, 1839-1920)為例，他仍強調北方參與戰爭的正當性，而堅持奴隸制度的南方則是完全錯誤的，見孫同勳，〈美國史學家對南北戰爭的解釋之演變〉，頁6-7。而出生於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Cleveland, Ohio)的實業家與歷史學家詹姆斯·羅茲(James Ford Rhodes, 1848-1927)，在其1918年普立茲獎(The Pulitzer Prizes)歷史著作獲獎作品《內戰史》(*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1861-1865*)一書中同樣認為奴隸制度是不道德的，內戰主要的導火線就是南方執意繼續保存並擴張其邪惡的奴隸制度，而北方基於倫理道德加以反對所致。因為南方堅持奴隸制度，所以南方是錯誤的一方，而南方一些主要政治領導人如約翰·卡洪(John C. Calhoun)與傑佛遜·戴維斯(Jefferson F. Davis)等，都應該擔負戰爭的責任，見James Ford Rhod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Compromise of 1850 to the McKinley-Bryan Campaign of 1896*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Vol. 1, p. 380. 不過此種將內戰的根源歸咎於南方堅持其邪惡的奴隸制度，以及南方因此必須負起較多的戰爭責任等的簡單論述方式，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有了明顯的改變。艾倫·尼文斯(Allen Nevins, 1890-1971)同意奴隸制度與內戰有極密切的關聯，但不是奴隸制度本身的道德性引爆戰爭，而是當時南、北雙方均不願正視因奴隸制度所引發的諸多爭議，並就該制度與相關的議題提出妥善適切的解決方案所致。尼文斯更直言美國國會從1848年至1860年的十二年間沒有提出一項真正解決南、北區域爭議與衝突的法案，「國會立法的功能逐漸萎縮，整個國會充其量不過是個討論會或辯論大會，淪為政黨與區域間相互角力的場所。」詳見：Allen Nevins, *The Emergence of Lincoln* (New York: Scribner, 1950), Vol. 2, p. 468, *Ordeal of the Union* (New York: Scribner, 1947), Vol. 1, p. 163.



奴隸制度與南方社會及南方人的關係為何？尤金·傑諾維西 (Eugene D. Genovese) 在 1965 年出版的《奴隸制度的政治經濟層面》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Studies in the Economy & Society of the Slave South) 一書點出了兩者之間的密切關聯性。傑諾維西強調奴隸制度形成了所謂的「南方獨特性」 (southern distinctiveness)，該制度不但是南方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核心動力，更將南方塑造成一個與北方完全不同的社會與政治型態。傑諾維西形容內戰前的北方為一個「資本型態社會」 (capitalist society)，人際與社會關係複雜。北方人習於將所賺得的資本重新投注於工業生產與製造上面，因而得以累積更多資本。反之，南方則尚未進入資本型態社會，仍屬於「前資本型態社會」 (pre-capitalist society)，社會的基本結構就是奴隸與奴隸主的對應關係，因此南方社會的人際與社會關係較北方社會單純許多。傑諾維西認為南方的經濟發展始終無法超越北方，因為在「奴隸主階級」 (slavocracy) 的帶動與影響下，南方人累積資本的方式是習慣將其獲利不斷投資於奴隸與土地的購買上。為確保經濟來源的穩定，以及奴隸制度與經濟體系維持不墜，南方因此必須不斷擴張其領土。然而當現行體制無法繼續滿足南方這種需求時，體制外的解決方式，亦即自聯邦分離，自然成為南方的唯一考量。<sup>3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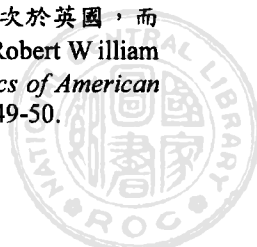
<sup>31</sup> Eugene Genove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Studies in the Economy & Society of the Slave Sou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5), pp. 13-36, 101, 243-270. 1986 年普立茲獎得主、前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詹姆斯·麥克佛森 (James M. McPherson) 對南、北區域的社會型態有進一步的解析。他引用德國社會學家費迪南·涂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 於 1887 年所提出「社群」 (gemeinschaft) 與「社會」 (gesellschaft) 的概念，說明內戰前南、

傑諾維西認為奴隸制度與南方社會已合而為一，無法切割。然而，當北方各州自 18 世紀末起陸續廢除奴隸制度時，南方人何以仍對奴隸制度產生如此高度的認同，並誓死捍衛之？1970 年代的史學家首度提出兩個深具影響力的論點，並廣為學界所引用。第一，南方人悍衛奴隸制度，是基於種族主義觀念所引發群體的「種族恐懼感」(racial fear)所致。第二，南方人將奴隸制度視為傳統美國價值之一，而這觀念，已成為南方人意識形態中牢不可破的一部分。

以「種族恐懼感」而論，在南方社會中，全體的白種人，無論階級高低，無論蓄奴與否，都屬於統治階級，享有相同的民主權利與義務。這種「統治階級民主政治」(Herrenvolk Democracy)不但建構了南方政治運作的基礎，更維持了白人階級的統治地位，以及白人社會的

---

北社會發展的差異。麥克佛森認為，南方社會建構的基礎主要來自於南方人彼此間相類似或共同的情感，因此仍屬「社群」型態，其社會的階級明顯，強調傳統與緊密的人際、群體關係。相較於南方社會，北方則屬於「社會」型態。北方社會組成的動力多基於北方人習慣對利益的追求，而非基於傳統的在地情感。雖然北方社會的流動性較強，但官僚制度充斥，且人較現實冷漠，詳見 James M. McPherson, "Antebellum Southern Exceptionalism: A New Look at an Old Question," *Civil War History* 50 (December 2004), pp. 423-42; Ferdinand Tönnies, *Community &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1988). 傑諾維西認為北方經濟實力遠超過南方，不過根據 1993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佛戈 (Robert William Fogel, 1926-) 與紐約州羅徹斯特大學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經濟學教授史丹利·英格曼 (Stanley L. Engerman, 1936-) 兩人的研究，雖然美國內戰前南、北社會發展的形態與步調異，但彼此的經濟實力實際上並無明顯差距。若將北方與南方各自視為一個國家，1860 年北方的富裕程度為世界第二 (第一為澳洲)，南方則高居世界第四，僅次於英國，而遠超過其他如荷蘭、法國、德國等歐洲先進國家，詳見：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pp. 249-50.



民主制度。白種人恐懼一旦奴隸制度瓦解，其統治地位與民主制度將無以為繼，白人非但淪為次等公民，南方社會也將陷入空前混亂。<sup>32</sup>

對於奴隸人口總數高居全國第二位的南卡羅萊納州而言，此種「種族恐懼感」至為明顯。史蒂芬·錢寧(Steven A. Channing)於 1974 年出版的《恐懼的危機》(Crisis of Fear: Secession of South Carolina)一書中，詳細分析了南卡羅萊納州自聯邦分離的過程，強調該州分離運動的原動力就是來自於「種族恐懼感」。錢寧認為南卡羅萊納州由於擁有數量龐大的奴隸人口，因此該州人民向來就十分在意北方任何有關反對奴隸制度的舉措與言論，特別是擔心北方的激進份子滲透並煽動該州的奴隸暴動。這種「種族恐懼感」在 1859 年發生的「哈伯斯渡口攻擊事件」(Harpers Ferry Raid)後達於巔峰。<sup>33</sup> 錢寧形容「哈伯

---

<sup>32</sup> 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p. 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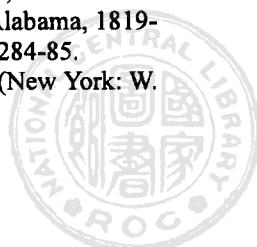
<sup>33</sup> 該攻擊事件是由北方激進的廢奴主義者約翰·布朗(John Brown, 1800-1859)所策劃，布朗欲籌集武器以支持其激進的廢奴運動，遂於 1859 年 10 月 16 日率眾攻擊位於維吉尼亞州哈伯斯渡口的聯邦兵工廠及彈藥庫。該攻擊雖迅速被弭平，布朗也遭處決，但整起事件的調查報告卻顯示此攻擊事件是出於預謀，且數名北方知名人士聯合出資暗助此次行動。「哈伯斯渡口攻擊事件」後加深南方人對北方即將策動南方種族暴動，並以武力全面摧毀南方社會的恐懼。以阿拉巴馬州為例，在該攻擊事件發生後，阿拉巴馬州的多家報紙即揭露布朗的黨羽之一，約翰·卡基(John Henry Kagi)，曾於事發前潛入阿拉巴馬州中部主要棉花生產區策劃奴隸暴動，報紙並要求對於行為可疑的黑奴直接施以鞭刑甚至是絞刑。阿拉巴馬州州長安德魯·摩爾(Andrew B. Moore, 1807-1873)也立即要求州議會立即撥款 20 萬美元加強民兵武裝與軍事設施，而州眾議院更通過正式決議案譴責北方，「以自身有限的道德觀與價值觀，欲以十字軍東征之姿，以謀殺、放火與暴動方式意圖摧毀南方制度。」整個「哈伯斯渡口攻擊事件」前後僅維持 3 天，但卻迅速升高南、北

斯渡口攻擊事件」直接挑動了南方白人最敏感的政治神經，讓南方人在「近乎歇斯底里」(near-hysteria)的情緒下意識到北方人正在積極圖謀摧毀奴隸制度，而南方白人對黑奴的統治權也即將消失。迨共和黨的林肯當選總統，南卡羅萊納人更加認定北方人大規模摧毀南方制度的行動即將展開，南方若續留聯邦，則奴隸制度與南方社會勢將無以為繼，因此脫離聯邦方為保障自我生存權之唯一方式。錢寧指出，長期以來，這種「種族恐懼感」將全體南卡羅萊納人緊密結合，最終導致南卡羅萊納州自聯邦分離，而這整個過程，完全是基於「一種非理性的認知所產生的一種符合邏輯的推論」(the product of logical reasoning within a framework of irrational perceptions)所致。<sup>34</sup>

---

對立的情勢，北方將布朗視為殉道者，而南方則將布朗的激進行動視為北方竭盡全力催毀奴隸制度的明證與序幕。Jeffrey S. Rossbach, *Ambivalent Conspirators: John Brown, the Secret Six, and a Theory of Black Political Viole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 Joseph Chamberlain Furnas, *The Road to Harpers Ferry* (New York: W. Sloane Associates, 1959); Rayburn S. Moore, "John Brown's Raid at Harper's Ferry: An Eyewitness Account by Charles White."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67: 4 (1959), pp. 387-95。北方對於「哈伯斯渡口攻擊事件」的反應，可參見：Stephen B. Oates, *To Purge This Land With Blood: A Biography of John Brow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pp. 308-356; Allan Nevins, *The Emergence of Lincoln* (New York: Scribner, 1950), Vol. 2, pp. 98-101。至於南方的反應，可參見：Stephen B. Oates, *To Purge This Land With Blood*, pp. 320-24; Allan Nevins, *The Emergence of Lincoln*, pp. 102-12; David M. Pott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1-1861*, pp. 380-84; *Alabama Beacon*, November 24, 1859; *The Weekly Confederation*, October 27, 1859; Marshall J. Rachleff, "Racial Fear and Political Factionalism: a Study of the Secession Movement in Alabama, 1819-186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1974), pp. 284-85。

<sup>34</sup> Steven A. Channing, *Crisis of Fear: Secession of South Carol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4), pp. 23, 286-93。



錢寧的「種族恐懼論」點出了南方社會中白人階層龐大內聚力形成的主要心理因素，但對於此種「種族恐懼感」究竟何時以及如何發生，錢寧則並未詳加說明。耶魯大學榮譽教授艾德蒙·摩根(Edmund S. Morgan)在其 1975 年出版，並接連囊括「美國歷史學家協會」、「美國南方史學會」以及「美國歷史學會」等學術著作獎項的《美國奴隸與美國自由》(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一書中，則對「種族恐懼感」產生的歷史淵源有深入且完整的說明。

摩根以維吉尼亞殖民地為研究對象，指出「種族恐懼感」最早始於殖民時期，隨著奴隸制度的建立而根植於白人社會中。摩根指出維吉尼亞殖民地早期的勞動來源，主要仰賴來自於英國，以白人為主的「契約工」(indentured servants)。但自 1660 年代起，隨著英國人口成長趨緩，國內就業率增加，導致「契約工」人數驟減，迫使殖民地不得不向外大量進口非洲黑奴以填補勞動空缺。<sup>35</sup> 另一方面，維吉尼亞殖民地於 1676 年所爆發的「貝肯之亂」(Bacon's Rebellion)，也加速殖民地政府建立以一套以非洲黑奴為主的人力勞動體系與制度。

「貝肯之亂」是由英國新移民納森尼爾·貝肯(Nathaniel Bacon, 1640-1676)所領導，並糾集一群不滿社會現狀與經濟環境的前契約工

---

<sup>35</sup> 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pp. 215-35, 295-308. 「契約工」與雇主簽訂勞動契約，工作年限通常由四年至七年。「契約工」在服勞役期間，其所受的待遇形同奴隸，雇主可對逕自處罰或任意轉賣。一般而言，在勞動契約結束時，「契約工」即恢復「自由人」(freedmen)身分。



與其他勞動階級所引發的一場階級動亂。<sup>36</sup> 摩根認為「貝肯之亂」正是導致「種族恐懼感」發生的主因。他強調，「貝肯之亂」結束後，維吉尼亞殖民地政府體認到白人階級之間的利益若分配不均，一群自認為被剝削的白人階層，如「契約工」，將會糾集同樣也被剝削的黑奴共同作亂，如此將會影響到殖民地的未來前途。基於這份恐懼的心理，殖民地政府遂將社會階級依黑、白膚色區分為奴隸與非奴隸兩大階級。屬於非奴隸階級的白人，不論其社會背景與經濟能力有何差異，其階級均高於奴隸階級，享有統治階級的自由與權利。維吉尼亞殖民地議會因此於 1680 年起陸續通過一連串的奴隸法案(slave codes)，對奴隸的運用、待遇以及社經地位作出明確規範，將歸類於被統治基層的非洲黑奴的社會地位法制化，奴隸制度因而確立。<sup>37</sup>

很明顯的，摩根教授認為種族主義與奴隸制度兩者互為因果關係，不過種族主義發生在前，奴隸制度的發展在後。奴隸制度在殖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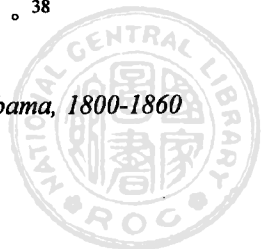
<sup>36</sup> 貝肯由 1673 年自英國至維吉尼亞殖民地定居。當時殖民地面臨經濟不景氣，再加上服完勞役成為自由人的前契約工人數急遽增加，造成失業率大增，導致民心不穩，貝肯因此主張殖民地應向西擴張領土，並曾多次率眾越界為爭地與印地安人發生衝突。貝肯的激進做為與當時殖民地總督威廉·柏克萊(William Berkeley, 1606-1677)的溫和印地安人政策相左。1676 年貝肯無視於殖民地禁令，集合失業遊民及社會不滿份子再次向印地安人屯墾地區發動攻擊，遂直接爆發與殖民地政府的衝突。「貝肯之亂」前後延續約三個月，於 1676 年 10 月貝肯因病身亡而結束。關於「貝肯之亂」，可參見：Stephen Saunders Webb, *1676, The End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New York: Knopf, 1984); John B. Frazee, *Bacon's Rebellion: Prologue to the Revolution?* (Lexington, Mass., Heath, 1969); Wilcomb E. Washburn, *The Governor and the Rebel: A History of Bacon's Rebellion in Virgin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57).

<sup>37</sup> 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pp. 316-37.

地生根發展的原因，除了是客觀的經濟需求外，更是白種人爲防範階級與種族動亂，爲鞏固白種人權益，因而基於種族主義所建立的一套勞動體系與社會制度。

至於解釋南方人何以長期擁抱奴隸制度的第二個重要說法，當屬松頓(J. Mills Thornton) 提出的「意識形態論」最具影響性。在其 1978 年出版的《奴隸社會中的政治與權力》(*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 1800-1860*) 一書中，松頓以阿拉巴馬州爲例，強調阿拉巴馬人，甚至是大部分的南方人，無論其社會地位高低或蓄奴與否，對於奴隸制度的強烈認同早已根深蒂固於其意識形態上。松頓表示，阿拉巴馬人將其對奴隸制度的堅持，視同對所謂「美國價值」(American values)，如人民主權、平等、自由、共和與獨立等的堅持。對他們而言，奴隸制度是美國自殖民時期即存在的一種美國制度，奴隸屬於個人財產，而財產權不單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更受到憲法的明文保障，不是聯邦政府、北方人或任何壓力團體單方面就能輕易撤銷的。阿拉巴馬人與其他所有美國人一樣，都希望能平等的基礎上，享有其天賦人權，並保有其社會制度與經濟體系。松頓指出，阿拉巴馬人認爲他們對於奴隸制度的堅持，正是堅持人民自由意志的高度展現，因此，任何侵害奴隸制度的舉措，都是對憲法以及南方人平等權與自由權的挑戰。由於阿拉巴馬人認爲奴隸制度的存在與白種人所享有的平等自由互爲因果關係，無法切割，因此這種對於失去自由的恐懼自然形成阿拉巴馬人對於奴隸制度的堅持。<sup>38</sup>

<sup>38</sup> J. Mills Thornton, *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 1800-1860*



自 1850 年代開始，阿拉巴馬州的交通與經濟建設大幅開展，棉花出口獲利也持續增加，但此時「廢奴運動」(abolition movement)在北方卻也逐漸匯集成一股勢力。至共和黨崛起，南、北區域間的衝突日趨激烈，所有阿拉巴馬人對於現狀的不安與要求保障南方主權的呼聲也急速增加。松頓表示，阿拉巴馬人在 1860 年林肯當選總統後決定自聯邦脫離，其主要原因就在他們認為共和黨的獲勝，無疑是宣告南方人所享有的自由平等權利即將遭到剝奪，日後南方人在聯邦將成為次等國民。阿拉巴馬州決意自聯邦分離，就在避免成為被奴役的對象。<sup>39</sup>

## 五、結語

「區域主義」與「奴隸制度」是內戰前美國歷史發展的兩大特色。區域主義源自於南、北區域自殖民時期以來就已存在的差異性，而奴隸制度在南方社會的存在與發展，不但成為南、北雙方爭論的焦點，更成為區域主義急速膨脹的原因之一。雖說南、北區域存在著極

---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xviii-xix, 5-58.

<sup>39</sup> J. Mills Thornton, *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 1800-1860*, p. xx, 402, 442-61. 萊希·福特(Lacy K. Ford) 研究南卡羅萊納州偏遠地區不蓄養奴隸的小農與自耕農(yeoman farmers)階級，得出與松頓類似的結論。在其 1988 年出版的書中，福特強調，雖然富農與小農，奴隸主與非奴隸主分屬於社會中不同的團體，但他們同樣堅持所謂「美國價值」，認為個體的獨立與自主美國自建國以來的核心價值，而奴隸制度正是其中的一部份。對於北方在奴隸問題上的節節進逼，南方的小農與自耕農均深感其獨立自主的傳統即將被摧毀，為避免淪為無產階級，唯有自聯邦分離以求自保，詳見 Lacy K. Ford, *Origins of Southern Radicalism: The South Carolina Upcountry, 1800-186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122, 372.

大差異，但彼此間卻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就是任何尋求南、北區域調和的努力，無疑是緣木求魚，不切實際。著名的擁奴政治家，南卡羅萊納州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約翰·卡洪(John C. Calhoun, 1782-1850)即言，南、北雙方分屬不同世界，完全無法共存：

南、北雙方不能，也不應再如此繼續共存下去，如此只會增加彼此間的對立與相互攻訐，進而危及國家的完整與安定。我們必須明白，在這世界上，欲將兩個不同的人種成功地合而為一是極其困難的，徵諸於歷史也尚無前例可循。<sup>40</sup>

---

<sup>40</sup> John C. Calhoun to Anna Maria Calhoun, January 25, 1838, in "Correspondence of John C. Calhoun," ed. by J. Franklin Jameson,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899*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0), Vol. 2, p. 391. 卡洪生於南卡羅萊納州，大學就讀耶魯大學並主修法律。卡洪政治經歷豐富，歷任聯邦眾議員(1811-1818)、戰爭部長(1817-1825)、國務卿(1844-1845)、副總統(1825-1832)以及聯邦參議員(1831-1842, 1845-1850)等要職，見Irving H. Bartlett, *John C. Calhoun: A Biograph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3); Merrill D. Peterson, *The Great Triumvirate: Webster, Clay, and Calhou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828年，美國國會通過新的關稅法案，以透過提高進口關稅的方式保護北方的工業產品免於來自英國的競爭，此關稅法案引發南方各州的強烈不滿，並將其稱之「可恨的關稅」(Tariff of Abominations)。因為南方農業耕種所需之機具多由北方工業集團所壟斷，而此一保護性關稅法案勢必增加南方農業生產成本，並降低其農產品的競爭力。為反對此保護性關稅法案，1832年南卡羅萊納州議會率先決議該州有權拒絕執行聯邦國會所通過任何侵犯州權的法案。而國會也隨即通過所謂「強制法案」(Force Bill)加以反制，賦予傑克森總統(Andrew Jackson, 1767-1845)有權做軍事動員以執行國會通過的法案，此為美國歷史上所謂的「拒絕執行聯邦法律危機」(The Nullification Crisis)。卡洪認為國會與傑克森總統的舉動無疑是對州權，特別是對南方的嚴重戕害，遂於1832年12月8日辭去副總統一職以為抗議，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於任內辭職的副總統。關於Nullification Crisis的相關論述，可參

同樣的，支持廢奴的北方政治家，如緬因州的共和黨聯邦眾議員伊斯瑞爾·瓦許本(Israel Washburn, Jr., 1813-1883)也指出南、北區域存在著極大的差異，難以統合：

南、北雙方不同的政治運作模式，代表兩相對立的意識形態，一為民主思想，另一為貴族思想。．．．．．民主思想強調人生而平等，而貴族統治思想則否訂基本人權，並以一己之私強行區分社會階級，亦即享有特權的統治階級，與被剝奪權力的被統治階級。<sup>4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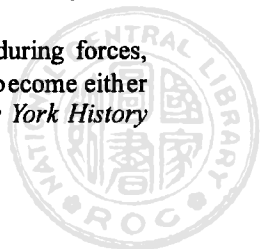
1858年10月25日，時為紐約州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的威廉·西華德(William Henry Seward, 1801-1872)在紐約州羅徹斯特市(Rochester)所發表的一場著名演說中，形容要求南方放棄奴隸制度，猶如要求新教徒認同天主教教義一樣的不切實際。他強調，南、北區域毫無相容與共存的可能性，南、北雙方終須一戰，這是一場「擋不住的衝突」(irrepressible conflict)。<sup>42</sup>

---

見：Donald Ratcliffe, "The Nullification Crisis, Southern Discontents,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Process," *American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y*, 2 (2000), pp. 1-3; John Barnwell, *Love of Order: South Carolina's First Secession Crisi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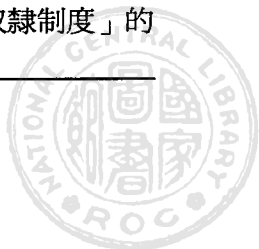
<sup>41</sup> *Congressional Glob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3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Washington, D.C., 1859), p. 299. 瓦許本生於緬因州，原為「惠格黨」聯邦眾議員，在該黨沒落後，成為「共和黨」的創始人之一。內戰期間，瓦許本擔任緬因州州長(1861-1863)。瓦許本在擔任國會議員期間，即以鮮明反奴立場著稱。Gaillard Hunt, *Israel, Elihu, and Cadwallader Washburn: A Chapter in American Biography*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25).

<sup>42</sup> 原文為 "It is an irrepressible conflict between opposing and enduring forces, and it mean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ust and will, sooner or later, become either entirely a slaveholding nation, or entirely a free-labor nation." *New York History*



南、北區域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長期存在的差異性是否就是導致內戰的主因？傳統的史學家討論內戰時，習於將區域間的差異做為基本架構，再以奴隸制度作為引發戰爭的主因，進而強調支持邪惡且不道德奴隸制度的南方須為戰爭的發生負完全的責任。時至 1960 年代，隨著美國在越南戰事逐步擴大以及各種社會運動的勃興，以往為人忽略的社會下層階級與族群，特別是黑人階級，開始受到廣泛的關注。影響所及，史學家也開始從更廣的視野來分析內戰生成的背景。

相較於以往，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美國史學家對於內戰的相關論述，至少有四點明顯的轉變與進步。第一，傳統上將南方視為一整體研究對象的研究方式已逐漸沒落，代之而起的是以南方個別的州為單一研究焦點所進行的深入研究。第二，以往探討何種歷史因素導致內戰發生的論述模式亦逐漸淡出，史學家在論及「區域主義」、「奴隸制度」與內戰的起源時，已不刻意將彼此的關係做直接的連結，而由道德層面來區分戰爭責任的論述方式已逐漸淡出。第三，史學家開始從「南、北雙方何以不能繼續共存？」的角度來重新審視內戰。其中最著名的論述，屬霍特所提出的「第二次政黨政治崩解論」，認為傳統政治制度的沒落，是造成南、北區域和平共存的局面至 1850 年代無以為繼的主要原因。第四，以往強調南方奴隸制度是阻礙南、北融合的主要障礙，並且造成戰爭發生的觀點，已不再為史學家所堅持。史學家跨越傳統藩籬，轉而由「南方為何如此堅持奴隸制度」的



角度來討論南方與內戰的關係，強調奴隸制度不僅是南方的人力制度與經濟結構，更是一種文化、生活方式、財產權與政治主權的象徵，並深植於南方人的意識形態中。對南方人而言，奴隸制度猶如國家制度的一部份，北方挾其政經優勢意圖摧毀奴隸制度，無疑是否定憲法賦予南方人在聯邦中的既有地位。南方人誓死捍衛奴隸制度，一方面是對傳統「美國價值」的堅持，另一方面則是恐懼奴隸制度一旦喪失，南方人將淪為次等公民，為北方所奴役，因此自聯邦脫離方為保障南方長治久安之道。

(本文責任校對：歐陽馥)



## 徵引書目

### 一、中文期刊

1. 孫同勛，〈美國進步史學初探〉，《美國研究》12：1（台北：1982.3），頁1-26。
2. 孫同勛，〈美國史學家對南北戰爭的解釋之演變〉，《美國研究》11：2（台北：1981.9），頁1-37。

### 二、英文專書

1. Richard Alden, *The First South*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1)
2. Irving H. Bartlett, *John C. Calhoun: A Biograph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1993)
3. Charles A. Beard, *The 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7)
4. Steven A. Channing, *Crisis of Fear: Secession of South Carolin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4)
5. William J. Cooper and Thomas E. Terrill, eds., *The American South: A History* (Ne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1996)



6. Avery O. Craven, *The Coming of the Civil Wa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7. Jefferson Davi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nfederate Government* (New York: D. Appleton, 1881)
8.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95)
9. George M. Fredrickson, *The Black Image in the White Mind: 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 1817-1914*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
10. Eugene Genove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Studies in the Economy & Society of the Slave South*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65)
11. Jack P. Greene, *Pursuits of Happiness: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Early Modern British Colonies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12. Gerald N. Grob and George Athan Billias, eds., *Interpretations of American History: Patterns and Perspectiv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2)
13. Holman Hamilton, *Prologue to Conflict: The Crisis and Compromise of 1850* (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4)



14. John Higham,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Inc., 1965)
15. Michael F. Holt,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1850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3)
16. Michael F. Holt, *Political Parties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From the Age of Jackson to the Age of Lincol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7. J. Franklin Jameson,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899*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00)
18. V. O. Key, *Politics, Parties and Pressure Groups*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1964)
19. Peter Kolchin, *American Slavery: 1619-1877*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3)
20. John McCardell, *The Idea of a Southern Nation: Southern Nationalist and Southern Nationalism, 1830-1860*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9)
21. James M. McPherson, *Ordeal by Fire: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1992)



22. Edmund S. Morgan,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75)
23. Allen Nevins, *Ordeal of the Union* (New York: Scribner, 1947)
24. Allen Nevins, *The Emergence of Lincoln* (New York: Scribner, 1950)
25. Michael O'Brien, *The Idea of the American South, 1920-1941*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9)
26. David M. Potter, *The Impending Crisis, 1848-1861*, completed and edited by Don E. Fehrenbacher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76)
27. Thomas J. Pressly, *Americans Interpret Their Civil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28. James Ford Rhodes, *History of the Civil War, 1861-1865*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7)
29. James Ford Rhod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Compromise of 1850 to the McKinley-Bryan Campaign of 1896*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0)
30. George Brown Tindall, ed., *The Pursuit of Southern History: Presidential Addresses of the Souther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35-1963*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31. J. Mills Thornton III, *Politics and Power in a Slave Society: Alabama, 1800-1860* (Baton Rouge: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32. Henry Wilson, *History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lave Power in America* (Boston: J. R. Osgood and Company, 1875-1877)

### 三、英文期刊

1. Avery Craven,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the Civil War: Egocentric Sectionalism,"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7 (1941), pp. 3-18.
2. James M. McPherson, "Antebellum Southern Exceptionalism: A New Look at an Old Question," *Civil War History*, 50 (2004), pp. 423-427.
3. Edward Pessen, "How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Were the Antebellum North and South?"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5 (1980), pp. 1119-1149.
4. James G. Randall, "The Blundering Generation," *The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27 (1940), pp. 3-28.

### 四、英文報紙

1. *Alabama Beacon* (Alabama), 24 November, 1859.
2. *DeBow's Review* (Louisiana), October 1860, pp. 448-65.
3. *The Weekly Confederation* (Alabama), 27 October, 1859.



## 五、英文原始檔案

1. “A. W. Fenton Papers,” The Manuscript Department of the William P. Perkins Library, Duke University.
2. “John Henry Rogers Papers,” Southern Historical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Chapel Hill.

## 六、英文資料庫

1. “Congressional Glob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3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Washington, D.C., 1859)
2. “Historical Census Browser,” University of Virginia, Geospatial and Statistical Data Center.
3. “The 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 16th Congress, 1st Session (Washington, D.C., 1820)



## Major Interpretations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on the Relevance of Sectionalism, Slavery,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Ling-Pei Lu \*

### Abstract

The American Civil War has always attracted the most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The early discussions of the war in the late 19<sup>th</sup> century were used to charge either side of the North or South for rebellion and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tragedy. Following the 20<sup>th</sup> century, the Civil War interpretations made by “professional historians” became more rational and objective. During the 1960s and the 1970s, historians began to view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from new prospects and drove the Civil War study into a new direction. Unlike traditional scholars who simply connected sectionalism and slavery with the origins of the conflict, historians in the 1960s and the 1970s attempted to explore the dynamic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could no longer co-exist in the 1850s even sectionalism had been existed in the country since the colonial period. In addition, historians investigated southerners’ insistence on maintaining slavery by making further analysis on the role of this peculiar institution play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ideology, society, and civilization.

**Key words:** Sectionalism, Slavery, Secession, Abolition, Civil War, U.S. South, U.S. Historiography,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Soochow University

